***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*: *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*. By Gordon Mathews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11. xi, 241 pp.**

讀者從書名可以捕捉到本書的重點：重慶大廈、貧民區(ghetto)、世界(world)。*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: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* 是麥高登教授(Gordon Mathews)總結他和他的研究團隊在2006年至2009年間，於香港重慶大廈進行田野考察，訪問和觀察大廈內不同族群的活動和互動，而寫成的民族志。全書主要分成四部分：地點、人群、商品和法律，描述重慶大廈內的生態。

作者在前言已開宗明義點出重慶大廈的特點：「重慶大廈龍蛇混集，有來自南亞的商人、非洲的創業家、印度的臨時工人、東南亞尋求庇護的難民，以及來自世界各地囊空如洗的旅客。位處香港旅遊區黃金地段的重慶大廈破落殘舊，卻是『低端全球化』(Low-end globalization)的中心樞紐，與加爾各答、拉哥斯、三蘭港(Dar es Salaam)等地的市場建立緊密連繫」(頁1)，提綱挈領地帶出作者於本書描述的重慶大廈。

重慶大廈位處旅遊區尖沙嘴的黃金地段，附近有五星級酒店、大型購物商場、辦公大樓，不過大廈卻是以廉價而聞名：廉價的賓館、食攤、商品，連帶它的設施和環境，也都顯得廉價的落後。雖然是廉價，重慶大廈卻巧妙地凝聚了國族、宗教及文化背景迥異的人。大廈內大部分業主是華人，不過從事日常營運的是印度及巴基斯坦人，包括商店和賓館的經理、打零工的臨時工人。除了背包客或旅費緊絀的遊客外，大廈還聚集了許多來自非洲的商人，有些是來光顧大廈的商店，有些則是以重慶大廈為中途站，轉赴中國大陸做生意。當然還有一些來自東南亞或非洲來港尋求庇護的難民。

因為它的訪客和活動族群，重慶大廈緊密地連繫了世界各地，包括中南美洲、非洲、東南亞，還有中國華南地區。這些流動的人口也反映了商品的流動路線：從非洲或東南亞而來的商人和臨時工，從家鄉帶着零星的商品如傳統服飾，來到香港的重慶大廈售賣，然後又從重慶大廈或北上到廣州訂貨、買貨，然後把貨塞進行李箱，以航空公司的個人負重為限，以螞蟻搬家的方式把貨物運回家鄉銷售，賺取微薄的利潤。

商人路過或以重慶大廈為終點，選擇以這種「低端」的方式營商，主要是因為這裡買賣的都是便宜的貨品，主要以手機為主，其次是服裝。以手機

為例，買賣的有功能較遜的手機、「十四天」手機，以及大陸生產的「模仿」手機。作者根據2007至2008年的銷售情況推論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的手機，保守估計有五分之一是經由重慶大廈運往非洲的（頁106）。

作者嘗試在本書解答以下的問題：「為什麼重慶大廈會出現？為什麼要關注重慶大廈？」他認為，重慶大廈的出現，和香港的殖民地背景脫不了關係。因為曾是英國殖民地，大量南亞人才會聚集在香港活動，甚至定居——1960年代重慶大廈建成的時候，已經成為了南亞人的聚腳地。然後，作者分析大廈的地理、香港的背景等因素歸納出三個原因：重慶大廈的廉價、香港相對寬鬆的入境政策，以及南中國工業蓬勃發展。這三個因素促使了發展中國家的冒險家來到重慶大廈「尋夢」，希望賺到金錢以改善生活。

促使重慶大廈出現的這些現象，背後其實還有一重要的哲學理念支持：新自由主義。作者指出，殖民政府在回歸前為了加強其統治的正統性而崇尚經濟發展，因此新自由主義成為了香港的主要意識形態（頁211）。新自由主義奉自由市場為最高原則，因此香港政府也就在某些政策制定及執行上，例如是入境政策、商品的流通（尤其是從中國大陸南下來港）都特別寬鬆，這正是重慶大廈「賴以生存」的必要條件，缺少了其中一項，重慶大廈的發展亦會隨之改變。

其次，另一個由新自由主義促成的現象是，在這個殘破的大廈內，不同族群、宗教可以相對地和平共存，例如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人，或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南亞人和信奉基督教的非洲人。「搵食」是他們來到香港、來到重慶大廈的主要目的，因此國仇家恨也會被擱在一旁：「我沒時間和任何人打架！我來這裡是要賺錢！」是作者在重慶大廈經常聽到的說詞。（頁213）

作者在書中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是，「為什麼要關注重慶大廈？」這關乎於重慶大廈在世界扮演的角色，一個關於「全球化」的角色。本書不單只是民族志，它還提供另一角度重新檢視全球化問題。全球化理論是現時炙手可熱的議題，涉及政治學、經濟學、媒體及文化研究，討論者眾、學派紛陳。對全球化描述最多的是經濟全球化，跨國貿易、國際勞工分工、市場全球化等都是其關心的重點，追本溯源，其核心思想跟世界體系理論不無關係。Immanuel Wallerstein 等學者在世界體系論中把國家分為核心國家（Core nations）、半邊陲國家（Semi-peripheral nations）和邊陲國家（Peripheral nations），在全球分工系統裡，核心國家的企業把資本投向邊陲國家或半邊陲國家，轉移其部分業務到這些國家，以減低生產成本。這些企業亦因此而擴展成跨國企業；邊陲國家亦因國外投資工業，帶動出口貿易以至國內經濟發

展，這些國家或會升格為半邊陲國家，並力求晉升為核心國家。

全球化論述在這幾十年冒起，另一個原因是互聯網的發展，大大加速「時空壓縮」，國與國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，只需一個按鈕，資本就可以由一國轉移至另一國；資訊的傳送也同樣地快速，流通零時差，某地發生的事，透過媒體網絡即時傳送至地球的另一邊。

這些全球化的論述近年受到質疑，愈來愈多的研究指出，全球化實質早已存在；例如歷史學者提出，自1450年，全球網路已經開始形成，並漸趨緊密（J. R. McNeil & William McNeil，《文明之網：無國界的人類進化史》，臺北：書林出版，2007，頁169-229），當中的緣起正是世界網路連結日趨成熟，航海路線尤其吃重。由最初的商業貿易（甚至奴隸買賣），到後來的政治及軍事、宗教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，世界文明藉全球化而於1450年至1800年間產生巨變，至今仍具影響力。

Osterhammel 及 Petersson 指出，理解全球化與其是由上至下的檢視，倒不如由下而上建構，因為通過網絡呈現的個體互動，更能解釋全球化（Jurgen Osterhammel & Niels Petersson，《全球化簡史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2014，頁18）。這正好為本書下一註解：作者在書中描述重慶大廈的低端全球化，是人的流動和活動的結果。這種聚焦某一地域的人與人之間的親身接觸和交流，在全球化的研究中並不常見（作者在書中舉例 Arjun Appadurai 和 Ulf Hannerz 等人類學家也曾研究並發表全球化對個人及群體的生活方式的影響），而本書正好為此增添一筆記錄。而更重要的是，作者在重慶大廈的低端全球化現象發現，被摒棄在世界邊緣的非洲及東南亞諸國，如何在現今經濟環境與世界接軌。這個接軌方式，跟經濟全球化（或可對應低端全球化而稱之為「高端全球化」）的論述背道而馳：資金和人口流動並非由核心國家流向邊陲國家，而是相反地由邊陲國家的商人帶着相對低金額的資金，主動流向核心國家。

本書進一步指出高端全球化論述的一些盲點，例如是個體與個體、個體與國家之間的互動細節在全球化之下是如何運作，以及邊陲國家及半邊陲國家如何融入現今的世界市場。這些細節一直被高端全球化抽象又籠統的論述所掩蓋。作者透過重慶大廈這獨特例子，讓讀者一窺堂奧，跳出固有的藩籬，反思全球化的眞貌。

本書出版以來，作者多次被人問及「為什麼（研究的）是重慶大廈？」田野考察沒有必然的原因，對這樣的問題也難有既定的答案。作者指出，重慶大廈破落殘舊，在熙來攘往的鬧市中，卻像是被隱藏了一樣，它的故事不

為人知、乏人問津，直至作者以人類學角度，將重慶大廈及各個在當中活動的人和他們的故事，向世界各地的讀者展現出來。本書出版後，獲得一致好評，媒體訪問、名人推介、榮登書店暢銷排行榜、得獎好書殊榮……這是作者研究所得的成果，亦揭示了讀者對香港的人文研究是有需求的：香港還有多少如重慶大廈般的滄海遺珠？如果讀者問「為什麼是重慶大廈」，相同的問題也可以放在其他地方、社區、族群。人類學角度寫成的民族志，對普羅大眾及不同領域的學者而言，都是了解某地區某群體的上乘之選，而且它逐漸成為學術研究和普及知識的潮流。重慶大廈的研究，正好提示人類學學者及歷史學者需加把勁，發掘更多具啟發性的研究題目。

鄧秀貞
香港科技大學語文中心

葉崗、陳民鎮、王海雷合著，《越文化發展論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5年，362頁。

葉崗、陳民鎮、王海雷的《越文化發展論》（以下簡稱《發展論》）一書是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結項成果，無論是材料的使用還是理論的提升，都是近年來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突破。該書試圖勾勒出越文化發展的軌跡，並提煉出越文化「點狀突進」的發展規律，其着力點不限於「史」，還在於「論」。在「史」的方面，作者充分借鑒了分子人類學、考古學、新出土文獻等方面的新材料。尤其是對分子人類學相關成果的借鑒，是近年來史學研究與分子人類學研究相結合的嘗試。「史學與基因的交融雖然艱難，但互動已經開始」（徐傑舜、李輝，《嶺南民族源流史》，昆明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，頁513）。這方面的嘗試，該書在論述越文化的「先越文化」、「越國文化」兩個階段時有所體現，本文的評述便集中於此。

在論述于越的族源、吳等周邊民族的源流、百越的源流、越地的民族變遷、秦帝國統一背景下的民族融合、越文化的海洋性諸問題時，《發展論》均對分子人類學的研究成果有所關注。徐傑舜、李輝合著的《嶺南民族源流史》（以下簡稱《源流史》）也是充分借鑒分子人類學研究成果的新著，《源流史》與《發展論》兩書的重要交集是關於百越源流及遷徙的研究。前者的研究主要以李輝有關澳泰族群遺傳結構的系列研究為基礎，該書勾勒出